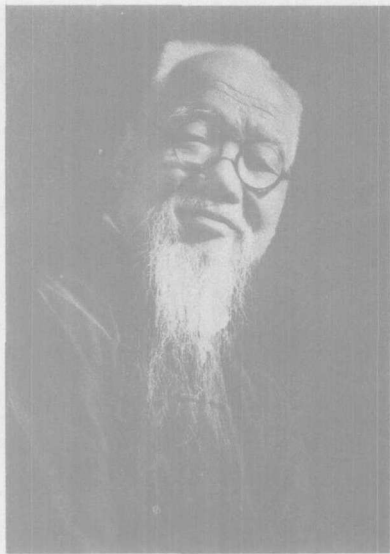




## 真力弥漫 韵馥葩奇

### ——记茹欲立先生的书法艺术

温友言

茹欲立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生前曾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不仅因其高风亮节，道德文章为世人所敬仰，而亦因其独具神韵的书法艺术为世人所推崇。正如于右任先生在《赠茹卓亭》诗中所赞誉的：「清风誉神州，翰墨博古今」。

先生字卓亭，陕西三原人，生于一八八三年，卒于一九七二年。七岁始，受业于晚清进步学者朱佛光先生门下。就学期间，不仅学业优异，对书法亦十分热爱，所书魏体倍受师长同学赞赏。后就学三原宏道书院，与同学于右任相友善，不仅建立了道义之交，而且结下了翰墨之缘。一九〇五年秋，茹欲立被选拔为陕西省首批公费赴日本留学生。赴日后，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下，旋即加入同盟会，并与陕西部分留日同学共同创办《夏声》杂志，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夏声》杂志的刊名，即先生以魏体书写。那笔力雄健，结体严谨的「夏声」二字竟成了他最早面世的著作。一九〇八年先生因参加留日学生反清风潮被遣送回国，回国后先后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曾任秦院复汉军政府秘书长及陕西靖国军总参

谋长等职。一九二八年，出任国民政府审计院副院长。一九三〇年审计院改为审计部，先生出任第一任部长。一九三二年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拂袖弃官。抗日战争期间，先生以共赴国难的心情，数次出席国民参政会。但终因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不满，于一九四〇年退出参政会。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检察署副署长等职。数十年间，先生或投身于军事、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或闲居家中，无论事务多么繁忙，生计如何艰辛，挥毫染翰，始终不曾中断过。三十年代先生就已名噪书坛，于右任先生曾感慨地评论他的魏体为近百年所未有。

先生一向认为，学习书法必先远追秦汉魏晋，进而唐宋碑刻和法帖。他曾言：「不学北魏则终不能攀欧、褚。」自清季以来，碑版、摩崖多有发现，故拓本也较易购得，这就为学习和研究书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先生每遇好拓本，辄倾囊购之，临习事写，苦心钻研。他尤喜欢《龙门二十品》的秀拔险峻，锋芒显露，《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贾思伯碑》的整练方折，精能宕奇，《郑道昭诸碑》的舒展自如，遵

劲奇传，以及《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的险劲雅健，方圆并举的风格。另外，还对南方晋宋之大小二篆特别赞赏，故临写亦多。因此，在先生的书法中广泛吸取了各碑之长，并融会贯通之，写出了自己独具风采的魏体。其运笔大起大落，刚劲有力，其结体严整秀美，筋骨内含。如三十年代为南幼文先生所书之枚乘《七发》四条屏，自然奔放，用笔似有居高临下之势。一九二五年所书之《于母房氏墓志铭》可谓先生魏体书法的代表作。于母，乃于右任先生之伯母也。全文七百八十余字，字字精到，笔笔不苟。该墓志铭盖为其友人吴昌硕所篆，一篆一魏，相得益彰。四十年代所书之《重修龙桥碑》，亦为先生魏碑之佳作。笔者幼时，习字尝以之为临习范本，其书法之朴茂、严谨与俊秀，至今记忆犹新。近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茹欲立书法集》，感触良多，掩卷静思：自近代以来，善魏碑者多有，然能如先生如此之精到者又能有几人呢？

先生以魏体见长，其楷书功力自然深厚。章士钊先生一九五九年曾赠诗赞先生书法曰：「卓立开张茹

卓亭,偶缘王会入神京。空闻四裔传碑版,谁识三原有老成。……茹先生常对人言,书法的基本功在真楷,横不能平,竖不能直,则不足言行草。故先生对楷书用力极深,由魏碑到欧、褚、颜、柳,深得精髓。他所书之屈原《九章》、《离骚》、《杨虎城将军挽诗》等,皆笔力遒劲,方正严谨,呈现出唐人韵致。

在书法艺术上,先生十分尊重传统,但他并不墨守成规,而是熔诸家于一炉,集众长而独运。在讲究功力的同时,也力求风格的多样,他用魏体、楷书书写的墓碑、墓志等刻石的书法作品不少,风格变化自如,无雷同之感。五十年代,我从先生学书,常见他在读过的旧报纸上临帖,但见一张纸上,三寸见方的字整齐排列,从不折纸、打格,字成之后,皆大小相宜,疏密得当。今天,当我们欣赏先生书法作品的时候,不仅其用笔结体令人叹服,他那章法布局、字与字相互照应,行气的贯通,以及整幅的气韵等,均令人赞叹不已,这些正是他长期磨练的结果。他的案头常年放有一叠历代名帖,随时翻阅研习,反复体味,不以浅尝为满足,其中有许多已被他临写过数十百次。无论酷暑寒冬,每日伏案习字,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特殊情况,极少中断。直至先生病逝之前,虽已年近九十,但提笔握管,手指从不颤抖,这和他长期的锻炼分不开。

先生于魏、楷之外,亦工隶、篆和章草各体,这些构成了他书法艺术的综合性特征。先生的篆书,取法金文、石鼓,吸取其古意,又参以邓石如、吴大澂之用笔结体。故先生的篆书呈现古拙苍劲之势。他虽恪守《说文》字形,但亦求变化,字呈方形,更显得结体之巧妙。现存先生所书之《芝罘东观文》,可为篆书的代表作。先生的隶书,不仅结体严谨,神韵生动,而更有汉碑的朴拙奇肆,潇洒遒秀之遗风。从现存先生四十年代所书之《杜公禹庙诗》,即可感受到先生隶书所独具的艺术风格。

章草这种字体,虽今人少为,而先生偏爱之。他的诗文、书札多以章草书之。问起他为何喜欢写章草,他曾说:「古张芝之为《草圣》,盖由于他取前人之长,因章草而变之,然后推陈出新创今草一体。」正因为如此,他才对由隶到草,起承前启后的章草特别喜爱,所写尤多,亦以章草名世。他推崇孙吴皇象、西晋索靖的章草,曾对自己收藏的《皇象急就篇》,以及《淳化阁帖》中的章草临写有年。随着近代简帛的不断出土,滥觞于汉的章草真迹公诸于世,四十年代以后,他又对《流沙坠简》、《居延汉简》、及《楚帛书》等进行研究。他于考证文字的同时,更着重于书法艺术的探讨,广泛吸取简帛书的笔意,从而使章草写得更加内含外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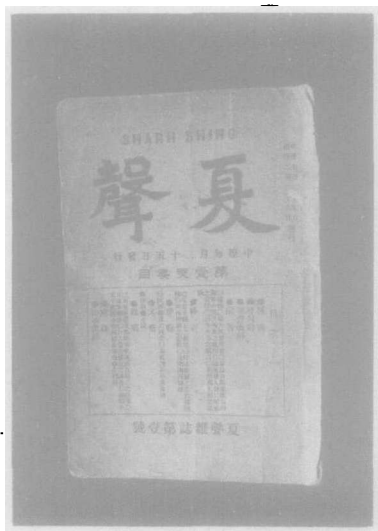
读先生的书作,会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艺术感染力。那含蓄蕴藉、端庄道美的书作所带给人的高雅气息除了来自于他深厚的书法功力外,正体现了他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修养。

早在三十年代先生就精于金石考证和文字学的研究,其后更用心经史和诗词的探讨。他曾对宋赵明诚《金石录》中所著录的碑版器物多有订证。如他在《孔庙礼器碑》拓本题记中,就对赵明诚《金石录》跋尾所述:「所谓鹿者,礼图不载,莫知为何器,皆不可晓,故详著其以俟知者。」作了考证,又在题记中对其中文字作了三段补记,从这几次题记中,即可想见先生在进行书法研究的同时,对于文字考证之谨慎和治学的严谨。

先生在书法研究方面,从来不是就书法谈书法,就写字论写字,而总是把书法放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范畴中去研究。由于他立足点高,所以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考古学与文字学方面的知识等,都包含在里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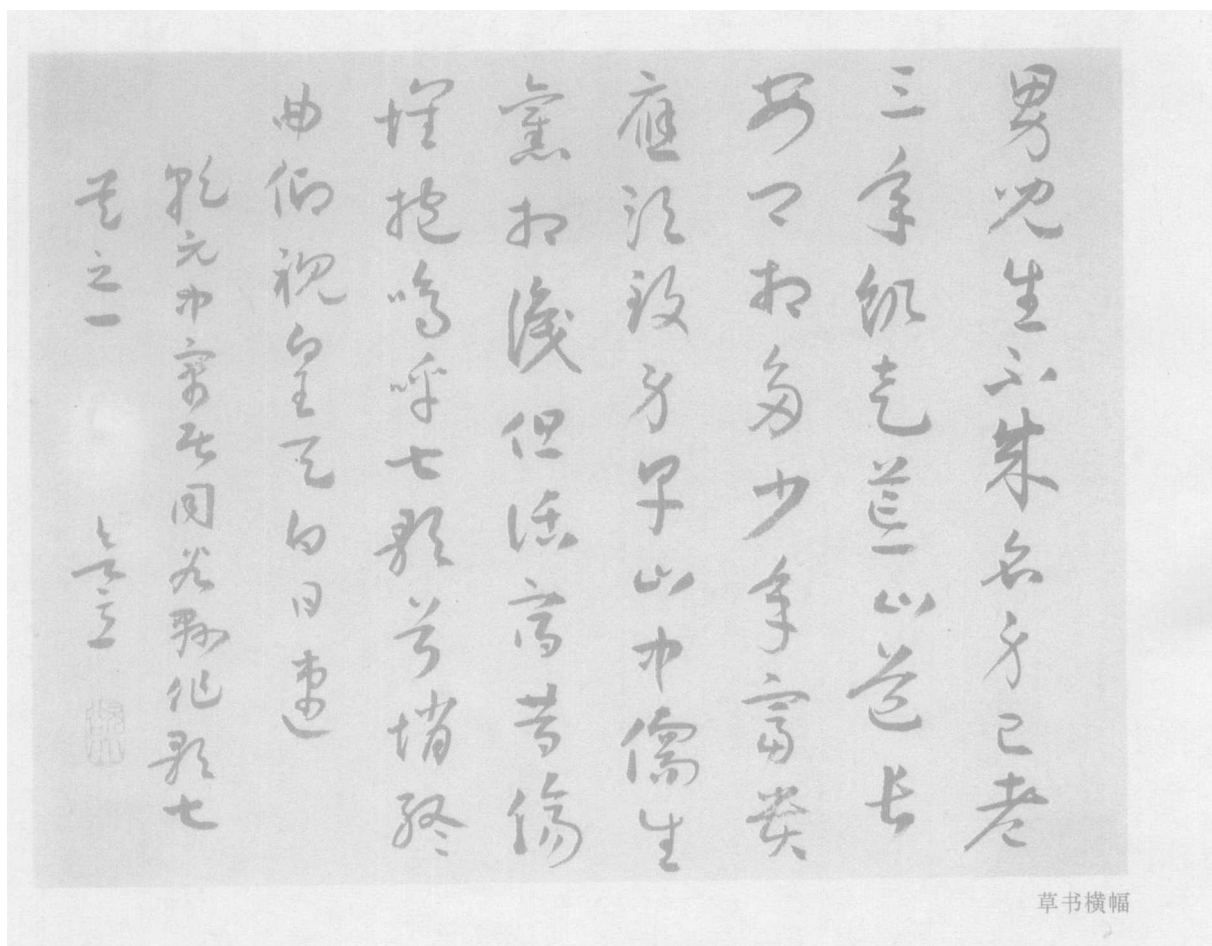
这里,有一件往事值得一提。一九三三年先生客居上海,时洛阳《三体石经》出土,引起学术界的重

《夏声》杂志封面



视。先生也致力于《三体石经》的研究,当他得知章太炎先生已写成《新出三体石经考》,立即借来阅读,顿感与自己见解相同,不胜欣慰。太炎先生年长于茹先生十四岁,茹视章如师,他以崇敬和兴奋的心情挥毫,写成了《章先生三体石经考》草稿,文中有:「民国十二年,洛阳石出土,毡蜡初成远寄来,欲寻真赏窥庭户。先生(指太炎先生)一见喜欲狂,宝玩不异陈仓鼓。中原文武扫地尽,麟出今将为谁某。披图握管手不停,考订遗经夜至午。蔡邕石经何时立,邯鄲子叔生先后。熹平下数迄正始,甲子方周末云久。一体未该三体出,乃知邯鄲意别有。石数古今无定说,先生度量求中数。尚书卅篇字万余,春秋经传又几许。算及秋毫虽未尽,我信已得十八九」等句。这篇稿子草成于于右任先生宅中,正值于右任有事谒见章太炎,顺便将此稿带去,章先生看后,称赞先生的才学,并欣然为之修改。这份经章太炎先生修改过的草稿,茹先生一直珍藏在身边,至今保存完好。六十年代,先生虽已八十高龄仍继续致力于《史记》、《说文解字》、《韩非子》以及屈原辞赋、杜诗的研究。那时,我正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去先生家不远,常去聆听教诲,每次先生都兴致勃勃的与我谈

# 茹欲立书法作品选



草书横幅

个后生晚辈谈古论今，讲授书理。从那时起，就使我真正领悟到了学问之于书法的重要性。

先生的书艺以骨气胜，刚直敦厚如其人。他重视书品，更重视人品，主张字正必先心正。他常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并以此启迪后学。他还说：“研习书法切不可沽名钓誉为目的。急功近利者难以脱俗出尘，入高尚清醇之境界。”他在教人学书时总是把自己学书的体会和经验毫无保留地讲给学生。他告诉我：“我学书法并无名师传授，古今名家皆为我师。关键在于多临碑帖，细心揣摩领会，博采众长，方能自成面目。有人一辈只写王右军的《兰亭序》，这并不是正确的方法。”

人世沧桑，在十年动乱之初，先生蒙冤备受迫害，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亦未停止写字，并对晚辈学书十分关切，对传统悠久的书法艺术前景始终充满着无限的信心。今天当人们缅怀他高尚的爱国思想和卓然不凡的人格气节的时候，更对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和对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佩，对他所留下的书法艺术作品倍加珍惜，真可谓“幸流风之未沫，示后学以鉴蹄”！